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非烟】	北大校庆120年，回忆“文革”武斗120天	唐 利
【亡灵祭坛】	文革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丁向阳
【国际风云】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何与怀
【劫后反思】	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真话与忏悔》序言	华新民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非烟】

北大校庆120年，回忆“文革”武斗120天

• 唐 利 •

120 现今是北京大学喜庆的数字，它正在紧锣密鼓地迎接120周年校庆，学校早就专门设立了“120”办公室。北大还和另外两个120有关：它经历过120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这在正史中只是草草带过，而其间有120天残酷惨烈的武斗，更是鲜为人知。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一）

我1963年考入北大化学系，1966年“文革”发生，到1970年分配，“文革”占了四年多，荒废学业，跟着推波助澜，同时见证了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人所共知，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全国大乱的火种，文化大革命大浪潮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第二个节点是1967年2月15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成立。

这个日子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揭开了北大分为两派的序幕。从此北大“文革”从“万众一心”团结在聂元梓周围，矛头向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战，转入了派性内战，自相厮杀。

在北大之前，绝大多数其他院校、单位，早已经两派打得热闹。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把“敌人”搁在一边，“革命阵营”两派内斗自相残杀，这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北大原本是聂元梓的一统天下，她俨然是毛和中央文革在北大的代表。北大分派是大势所趋，有聂元梓一面大旗，分派反倒比较落在后头。

2月15日，北大三个拥戴“校文革”的全校性组织，“红旗兵团”、“东风兵团”、“红教工兵团”合成一体，取名“新北大公社”。后来知道，事出有因，是为聂阿姨进入“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做铺垫。2月20日，首都红代会成立，一司、二司、三司各出代表，她一个光杆司令，“老娘的队伍才开张”，就如愿以偿当了“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组长。“红代会”总部设在北大俄文楼。

“新北大公社”成立，聂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聂卫军”，但另一部分人被边缘化，等于打入另册。比如我在的化学系三年级（编号0363），一部分人组成“红三团红旗”战斗队，加入公社，我们其他同学本来一直是支持聂元梓的，却被拒之门外。“新北大公社”自外于平常人，谁能热脸贴冷屁股呢。别无选择，平常人只好另起炉灶，先批评后反对，聂元梓就这样把大批人推到她的对立面。

实际上，后来成立的以反聂为主旨的“井冈山兵团”中，大多数人曾经是她的拥护者，却有的被排挤，有的被抛弃，有的被敌视，有的被打击了。凭着“化友为敌”的本事，聂元梓不折不扣是北大群众分为两派的始作俑者。

第三个节点，1968年3月29日武斗。

北大“文革”随后的派战愈演愈烈，弄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观点之争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几百年后的旁观者、局外人的眼光，恐怕不过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上不了台面，进不了史学主流。恰是后来的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两派斗争的性质，改变了北大“文革”的走向。那就是由聂元梓一派发动的3·29武斗，延续了120天，从此两派的观点路线之争已经退居其次，占据首位的是给不给井冈山活路的人权存否之战。

“文化”大革命，既不文化又不革命，派斗变成武斗，人类史上也算是一大奇葩。现在动不动就“震惊世界”，北大武斗确是可以算一件，将来一定逃不脱历史学家的法眼，会有人来分析它的历史逻辑，思索它的历史教训。

## （二）

北大武斗是从“3·29武斗”开始的，延续了四个月120天，时间之长，是北京高校之最，在全国也少见。

3·29之前，两派之间小规模零星的肢体冲突已经时有发生。不过，零星摩擦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全校的武斗，一点迹象也没有。对骂归对骂，互怼归互怼，口诛笔伐，谁也不会思虑到人身安全之虞。

哪知道，一场突然袭击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聂元梓调来汉中分校武斗有功的高云鹏，3月20日，“新北大公社”成立了以高云鹏为首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几天后，令人无从应对的夜袭就猝然而降。

68年3月28日是星期四，我们等到双方广播台的大喇叭战结束，校园恢复宁静，照常熄灯睡觉，进入梦乡。彼时化学系的男生住在31楼，两派对立严重，宿舍已经自行调换，“合并同类项”，同派的住在一起。不同派的不来往，偶尔见面不是形同陌路，就是怒

目而视。化学系“井冈山”编号“03纵队”，是“井冈山”的主力，以三年级的0363最为铁杆，深衔“新北大公社”一些人痛恨。

凌晨一点整，动手了！突然“咚咚咚”急促的砸门声把我惊醒，心里砰砰狂跳，睡眠惺忪，打开一条门缝，楼道灯火通明，两头都竖起了床铺挡住去路，各有几个身穿黄棉衣、头戴柳条帽、手持扎枪的人在把守。中间则有人挨屋砸门，对，不是敲门，伴随着大声吆喝。有人清楼了！我知道大事不好，立刻把门锁上，和同宿舍的一起，拉床顶住门，穿上裤子衣服，夺窗而逃。我们住的是一楼，不费力气，就跑出了31楼。

后来才知道，执行这次行动的是“新北大公社”一支特别能武斗，专门打硬仗的“钢一连”，“新北大公社”化学系“红三团”的人，当晚已经撤了，只是有人负责在“井冈山”男生住的宿舍门上做记号。

化学系四年级的同学住在二楼，不少人翻过窗子，扒着窗台，悬下身体，跳楼逃命。有同学逐个询问统计过，他们有17个人是这么干的，有人摔了轻伤，还有人落地后被公社埋伏的人追打，甚至扎成气胸。化学系五年级的老大哥住在三楼，面临毕业分配，只想图个太平，一般对“文革运动”兴趣不大。他们上百人举着手、排着队，在扎枪的威逼下清出31楼，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都不许带。

现在回想起来，3·29的血洗夺楼可谓策划严密，完美无缺。大兵从天而降，闪电式的行动。周围多处都有埋伏的武斗兵勇，“井冈山”有人从几处自发来救援，都被挡了回去。厉害了，我的社！31楼半数以上是井冈山的同学，二百多人，都是铁杆，一举被击懵，打散，赶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举动，要缜密设计，严丝合缝，不能有一点闪失。谁是总教师爷？是个高人。这样关系北大运动全局的大行动，肯定需要聂元梓的点头首肯，至少的。

“3·29武斗”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确切，那算不上武斗，没有双方交火，只有单方挨打、无力还手，甚至连对手都没看清，就糊里糊涂被扫地出门。这是一次单方施暴，武力清剿。是的，尽管没有死人，少部分人受了伤，这仍然是一次暴行。“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文革”结束了，暴力相对在北大成了主旋律。

### （三）

我们跌跌撞撞、零零星星跑出来的人，不知何去何从，像无头的苍蝇，在31楼周围乱窜。那天特别黑，人只有到了非常近才看得清，一边跑一边喊：“你是谁？我是×××。”最后大批人群集中到了31楼南侧的空地，找到同班战友。惊魂稍定，交流刚才的经历，脑中一片茫然。

大家以为新北大公社只是要抄什么，等到里面没有动静了，我们几个人向31楼走近，打算回去。哪知一阵砖头狂砸过来，打到地上，弹起来溅到身上，都是剧痛。我们惊慌失措，赶紧后退，左侧的38楼又飞来一阵砖头。我班只有一个蔡小海，一根筋，非要过去问个究竟。他一向与“井冈山”观点不合，反对派斗，自许公允，结果被新北大公社抓了过去，蒙上眼睛，捆上双臂，带到一个地方，棒打一番，连头部都挨了一拳，才放掉。他以后每描述那次经历，都气愤不已，从此转向铁杆反聂。

其实当时被打懵的，不只是我们这些净身出户，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小兵卒子。更找不着北的是“井冈山总部”的那些头头。据说他们在一起紧急开会几个小时争吵不休，拿不

出个主意。是啊，哪见过这种阵势，谁承想会有如此狠手！本来，井冈山兵团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散沙一盘，乌合之众，没有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全团服从总部之类的纪律。只有“反聂”两个字把大家连在一起，而程度、层次又各有不同，从胡纯和激进的“老井红”，到胡德平温和的“十一斗私批修学习班”。作为我们零派在总部的代表陈醒迈，素常被戏称为“陈老机”，寓意“老机会主义者”。

我们瑟瑟发抖，在黑暗中团团转了好长时间。焦急之中，总算传来总部指令，攻占32楼！我们赤手空拳蜂拥而去，像一伙暴徒，踹开门挨屋子找人。这个楼住的是中文系男生，“新北大公社”的人早已闻风而逃，整座楼立即被井冈山控制。化学系“03纵队”队长齐菊生指挥分配房间，我们0363的住四楼，几个人随便打开一个房间，就落脚了。

中午，由后勤部门青年工人组成的“海燕”战斗队占领了28楼，那里有“井冈山总部”和广播台，是“井冈山”这个群众组织的核心。

这时天亮了，突然听到有人喊：看！老破鞋在楼下！“老破鞋”说的是聂元梓，其实她只是结过两次婚，而且都“不幸”，两次“被迫离婚”，自己并没有作风问题，井冈山的人是往她伤口撒盐。我从窗口一看，聂元梓正在被一大伙人围着，旁边还有一个军人，向西面31楼走去。气不打一出来，我们几个人飞快跑下楼，要去和她理论。

来到31楼南门外面，已经有了一个重重包围圈。我们在外面大骂聂破鞋发动武斗，场面乱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人从人群中挤出，向东南跑去，后面一阵喊声“抓住他！抓住他！有人刺聂元梓了！”我们没弄清怎么回事，本能地知道要保护这个人，挡住追赶的路。我们人多势众，他们只好看着那个人一溜烟消失了。

这就是有名的“刺杀聂元梓事件”。“凶手”是我们年级的樊能廷，“慨而慷”战斗队（我们叫它“老慷”）队长。大学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我和他分到河北阜城县杨庙村，一条土炕上“同床”一年半。据当时传说他那天手里有一把红色木柄螺丝刀，挤进去举手比划了一下。没想捅出个大漏子，聂元梓头皮擦了一下，出了血。陪伴聂元梓“视察”的那个军人，来视察武斗现场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据说手上也挂出了一道痕。

不过这老兄几年前著文，说他与“刺聂”案的聂元梓后脑勺皮伤无关，诬他“刺杀”乃乌龙。现在这个事件又成为北大文革史中一个迷雾。

公社广播台“抓凶手”的叫嚷，立刻不绝于耳，某地方贴出聂元梓后脑勺的大照片。什么头部重伤，鲜血淋漓，什么黑把匕首，早有预谋……。照片我看过，其实就是擦点皮，抹点红药水。不过李钟奇（当年批斗会上一拳把彭德怀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因此后来声名受损）这回竟没能英雄救美，让“凶手”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心中窝火自不必说，信誓旦旦，要把这个“手持黑把匕首”的家伙捉拿归案。

聂头皮被刮，受了惊吓，她不想高姿态，她要出这口气，口诛笔伐，我们也无可指责。可是当时的第一要务是制止武斗，如果她发一句话，“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撤出抢占到手的31楼，让井冈山的人归巢，北大的事态就不会发展，武斗就会平息。可是，她把“被刺事件”说成是武斗的起因，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把挑动武斗的罪责栽赃给“井冈山”，如此倒打一耙，蒙骗上层，也蒙骗本派群众，“井冈山”就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校文革”发出“通缉令”，着意把事态搞大，转移视线。当晚，谢富治、温玉成来北大，要停止武斗，交出凶手，慰问老聂。此后，李钟奇又来北大，老调重弹，还是交凶手，警告不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武斗必须在校文革领导下解决。

重压之下，以侯汉清为首的总部决定，铁了心，所谓“凶手”就是不交。那天双方交换俘虏，“新北大公社”从44楼黑牢扔出奄奄一息的樊立勤。樊立勤只是动口舌，语言上反戡，他膝盖骨钉得粉碎，手指骨被老虎钳夹断，手指甲钉竹签，完全是渣滓洞那里学的一套。这个樊能廷要是送上去，还不被生吞活撕了。井冈山总部发出两号动员令，一句话，政治迫害，不接受。

现在的人可能不会理解，当时“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是重罪，要遭灭顶之灾的，不知总部这些人，在哪儿吃了豹子胆。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中，竟然多次说北大武斗是“林彪指使谢富治搞的”，描述说“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匕首扎在我头顶上血顺着脸往下流，我的衣服都是血。对用匕首刺我的人，我从来没进行过追究……谢富治是他的后台。”一个当过多年干部的人，说话如此夸张，瞎话连篇，印在书上，只能让人更加看不起。

井冈山惹不起谢富治，却不在乎李钟奇，嘲笑他“李排长”（我百度了一下，查无根源），还管不了我们。其实他是唯一一个接见过“井冈山”头头，说过“井冈山”是“革命组织”的人。

#### （四）

回到32楼，我感觉自己像噩梦醒来，换了人间，眼前一切都那么陌生，那么不真实，那么让人惶恐。大家都在建筑工事，七手八脚，拆暖气，暖气片放在窗台上，准备公社进攻时往下砸。大锤子咣咣地砸墙，砖头哗哗地落下来，我们收集起来，堆到窗口，准备向“敌人”扔去。出现了一批能工巧匠，暖气管用来作扎枪。不知到哪里弄来的锯子、锉子、螺纹钢，洗脸房成了工作间、兵工厂，叮叮咚咚，人声嘈杂。暖气管截成一段段，装上了矛头，有的还有红穗穗。没有枪刺的，斜着一锉，出来个尖。长短不齐，人手一支。我也有了自已的扎枪，其实就是一根斜锯口的暖气管，连一层棉袄也扎不透。但它是我的好伙伴，陪着我度过了武斗岁月。没事就练练，甩着头转一圈，再往前一刺，“杀！”睡觉时也放在身边。从31楼被赶出来，我就失去了全部家当，现在扎枪代替了红宝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信仰、思想，没有了，不得不用以代替的，是崇尚暴力。

我们从小受教育，爱护公物、遵纪守法，行为要中规中矩，这些观念顷刻间抛到九霄云外。国家财产随便毁坏，砸、劈、扔、摔，一点儿也不心疼，一点也不犹疑。情绪不能控制，怒气、怨气借此发泄，造反派的脾气。我们几百人丢了全部家当，就用别人的，想拿什么拿什么，翻箱倒柜，比用自己的还顺手，不顺眼就扔，对这种报复心安理得。一夜之间，“乖乖孩”就变成了“恶汉”。不知谁发给我一件黄棉袄，旧的。当时这玩意很时兴，只要执行任务，我就穿着它，不管天气多热。它一直跟着我到农村插队，油哄哄的，不曾洗过。我甚至穿着它去上海，拜见未来的丈母爹、丈母娘，让他们大惊失色，以为女儿搭上了小混混，差点坏了我的终身大事。

此时，一楼的房间完全撤空，窗子用木条钉牢，用卸下的门，木床顶死，用铁丝绑牢。楼上，该砸的砸，该拆的拆，碎石砖块就地取材，堆在窗口。这个时候，群龙无首，群众的情绪和行动最容易被少数人左右，只要有人一呼，就有人响应。自行车三轮车汽车内胎也搞来了，两头钉在窗框上，或者绑在床腿上，成了大弹弓。我小时候只玩过小弹弓，现在玩大的，放上碎砖头，比谁射得远，看谁射得准。有人甚至让别人抱住后腰，两个人拉弹弓。很长时间，这是武斗主要方式。当然，真正射中目标几率极低，只是起到震慑作用，楼与楼之

间几乎没有行人了。有一次，我班同学吕成信拉弓时砖头打到窗框弹了回来，还好躲得及时，只擦到脸上，留了一个伤疤，好悬！我从此再也不碰大弹弓了。

双方都如此，无所不用其极，我感叹：是什么力量把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这样？为什么“文弱书生”竟会变为破坏分子、暴民？难道就是简单的人性恶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小受到的“仇恨教育”——站稳阶级立场啊，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啊，对坏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啊，长期的灌输，这些观念融化在了我们的血液中。当认准对方是“阶级敌人”的时候，就显出，或者力图显出狼性，再狠也不过分，有些人甚至越过了道德底线、失去人性，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

“3·29武斗”事件，“井冈山”是无辜受害者，道义上占上风。但是暴力是胜者，很多“井冈山”的同学，觉得校园已经无立脚之地，开始了大逃亡。那几天如鸟兽散，海淀路，32路汽车，拥挤着逃难的人群，大包小包，肩挑背扛，自行车驮。投靠亲戚的，回老家的，寄宿在同学处的……。完全没有出路的，住到地质学院的大教室。现在中国有高铁，当年井冈山有“地铁”，地院东方红是铁哥们。那里是我们的大后方，几百个人住在那里，也可以帮助守楼的人做后勤供应。校内两派大分家，“井冈山”留校坚持守楼的只有几百人。

聂元梓的忘年交蒯大富，在他的回忆录《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中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基于后一条“那一派就垮了”的错误信息，他决定效法北大，他认为中央首长都批过414，打起来对他有利，于是发动4·23武斗，想一举摧垮对立面。人大、民院等高校也燃起武斗烽烟，北大再次夺得“榜样”地位，掀开北京高校武斗大幕。

## （五）

聂元梓把“井冈山”的人赶出31楼，是一次重大战术成功，随后的日子，双方在迅速进行整合，瓜分地盘，短时间没有新的面对面冲突。“井冈山”以将近北大师生半数的人数，只取得了28、30、32、35、36、37，这几座孤楼。而“新北大公社”迅速控制了周围16～44所有楼房，形成包围圈。“公社”又把守了五个校门，把持了所有食堂，不许另一派去吃饭，北大成为“公社”之天下，“井冈山”的劣势已成为定局。

有了这几座楼，井冈山必须占领35和37之间的36楼，才能连成岛链。经过各楼守楼战士多次呼吁，总部决定拿下这个孤岛。时间4月25日，化学系“03纵队”充当“进驻部队”。36楼原来由几个系女生混住，包括化学系女生。3·29事件以后，“新北大公社”的女生，按照她们组织的部署，陆续迁出这座楼。到4月25日，楼里只剩下二三十名“井冈山”的女生。我们上了几年大学，从来没进来过。这一次，一群脏了巴几、破衣烂衫的大老爷们不请自到，而且是狂呼乱叫，冲进来的。没有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女同学的闺房，有一种神秘感，那里的女生早已经跑光了，也算是“没有硝烟的战斗”。我推开一扇扇门检查，飘来淡淡的清香，看到别有情调的布置，果真跟我们这些“乱室英雄”的狗窝大不一样。我们七手八脚，拆暖气，砸床铺，找砖头，建筑工事，准备迎战。

聂元梓手下那么多能人，对于36楼竟然没有先下手为强，锁住井冈山的命门，无疑是个重大失误。4·26他们才来马后炮，力图夺取要津，于是一场恶战临头。

我从四楼窗外望去，黄压压的一片片，从34楼、38楼两个方向涌过来。戴头盔，身穿黄皮，手持扎枪，整齐划一，推进有序，喊声震天。前排的，举着床板掩护，要从窗户和门强攻进入，有人甚至架了梯子硬攻二楼。那场面，雄壮而恐怖，过去只有在电影的古代战争里看到。据说，孙蓬一亲自督战，势在必夺。

我感到热血涌头，却毫无恐惧之感。早已红了眼，只有一个念头，打退他们！鱼死网破，背水一战，只在今朝。砖头像雨点一样投去，大暖气片从窗台推下，咣当一声，我伸头一看，没砸着。

这暖气片巨型重物只是吓吓人的，上方轰然掉下庞然大物会使攻楼者魂飞魄散。不过现在想想也后脊梁发凉。万一失手落到谁的头顶上，自己的后半生将永无宁日，在梦魇中度过！

一楼顶不住公社的强攻，一时失守，对方强攻部队砸开西墙，冲进一个房间，破墙打洞向前推进。万般危急之中，我们年级的骆如铁情急智生，用大锤在二楼地板打了大洞，我们的人在上面用枪扎，用砖头砸，用水泼，终于把入侵者赶出楼外，36楼胜利守住！这是是北大武斗中最惨烈的一场，受伤者据说上百，基本是公社的。这对井冈山，是生死之战。广播台立即报道大好喜讯，“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们欢欣鼓舞，士气大振。

我猜想事后聂元梓、孙蓬一一定肠子都悔青了，没有早下手把36楼拿下。否则北大文革的历史会完全改写，28楼成为瓮中之鳖，“井冈山”头头们束手就擒，这个组织彻底摧毁……我常常陷入宿命论：难道真的在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保佑着井冈山？天不灭我啊。

井冈山总部不是省油的灯，固守36楼的4·26大捷冲昏了头脑，突发臆想，轻举妄动，竟然要主动招惹新北大公社！5月2日，派我们“03纵队”几十人，去38楼出击，抢什么木板床。楼里那么多床，竟然当成了稀缺货！

这种无厘头瞎指挥的事，我很恼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想上战场玩命！唉，派性高于一切，不理解也得执行，上了贼船不由己。临危受命，战前，纵队长齐菊生作动员，说，我们20岁的小伙子，除了没娶媳妇，什么没见过？这回要拼死一战，活出个样子！一针鸡血，群情激昂，杀声一片。我们几十个人，冲出37楼，手持七长八短的扎枪，缓步推进。远处，“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已经严阵以待。这样的面对面交锋，我很是恐惧，短短几秒，脑子里翻腾出无数想法，可能会受伤，被活捉，甚至死掉……但是咬着牙，决不能当怂蛋。

我们的装束，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戴柳条帽的，狗皮帽的，自制帽的，各人有各人的高招，简直就是一群“丐帮”。出发前，有人给了我一个几块铁皮串起来的“护胸甲”，套在脖子上，人一挪动，铁片铮铮作响。而对面的，俨然“正规队伍”——矿工头盔，铁网面罩，铁皮盔甲，武装上、气势上压我们一头。我俩眼睛盯前方，小步前移，突然右侧的腰一阵酸疼，一看从侧面杀出一支“公社”队伍，我看到的只是一张张模糊的脸，找不到是哪位老兄刺着我。被夹击了！在撤退的指令下，我们还没有和对方交上火，就溃不成军，逃了回来，这一次损失惨重，许多人受伤。

我不敢去校医院，就回了老家天津。做个检查，那块地方肉厚，无大碍，没伤内脏，只是扎一个洞，留个疤，也算是“文革”的纪念。酸疼不止，情绪不佳。刚呆几天，传来通知，“新北大公社”正在到处抓人，家不是安乐窝。不得消停，还是回到战友中安全。到此为止，双方各有捷报，又各有昏招，毕竟是书生，强拉上战场啊。

## （六）

4·26之后，北大武斗“割据”格局基本形成。

新北大公社完成了包围圈，是攻势，不断挤压井冈山的生存空间，不给活路。井冈山则元气大伤，武斗前用“批判的武器”对聂元梓主动出击挑战的气势完全没了，在“新北大公社”强大的“武器的批判”下，只能以偏安一隅，保命为主，一切为了生存。

“井冈山”一方要生存，“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方不许“井冈山”生存，成为北大武斗主线。

如果那一年五月也有校庆的话，该是整整70年了，也是大庆。可是当下一个两年都没有开课的学校，校园成了战场，学生成了暴民，建筑物到处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瓦砾遍地，流弹横飞，谁还记得有个校庆！“新北大公社”的人正在为收紧包围圈、“剿灭井冈山”而绞尽脑汁，“井冈山”的人则在为固若金汤而众志成城。

虽然六座楼连成了一串，“井冈山”有了与聂元梓“校文革”分庭抗礼的一隅地盘，楼与楼之间的来往却十分危险——“新北大公社”在周围楼群里布满了大弹弓，砖头不断从各个方向射来，没有死角，偌大的楼间空地布满了残砖碎瓦。“公社”武斗小分队还不时出来袭扰。井冈山楼与楼进口之间竖起两排木床，上面再盖上木床，形成封闭的通道。来往通行，虽然不断听到砖头打在床板上的声音，安全无虞，我自廊中信步。

为了双保险，36和32楼之间，28和32楼之间，挖了地道，由地质地理系同学勘察设计，住在两楼里同学用最原始的方法一锹一锹地挖土，抽屉、脸盆运土，三班倒挖成的。两头动工，中间会面，三米深，一人高，可并行交错，安有电灯，地湿漉漉，墙湿漉漉。其他楼之间也有地道相连，32到35，35到36。挖出的土存在一楼宿舍，公社的人神不知鬼不觉。由于没有坑木支撑，武斗停止后不久，一场暴雨，地道塌掉了。

“井冈山总部”所在的28楼，处在“割据区”最北端，为了和西边相距15米的30楼之间来往方便，决定在四楼架设天桥。从36楼拆下屋顶的松木人字梁做基本材料，在走廊里预制好二十米的桥身。打掉了28楼30楼相对的四楼楼道窗户和窗台，用床板做好桥的面板。一桥飞架东西，井冈山的人欢天喜地，都去过过瘾，平稳若坦途，同时通行三到四人，比如今张家界玻璃桥刺激，还有人合影留念，这里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自行设计，土法上马，群策群力。由技术物理系组成七八个人的土工程师团队，64级的况明星是总设计师，使出浑身解术，很有点高科技。施工时井冈山倾巢出动，五十多人在现场安装。32到35楼之间的桥则简单，只是个铁索桥，铺点木板，晃晃悠悠，要走得有当年大渡河十八勇士的胆量。当时的北京，还没时兴楼间天桥，北大“井冈山”做出了“创举”。

六座楼中，只有37楼靠马路，在院墙打出个豁口，木床搭成通道，一直伸向海淀路马路边，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出口。斜对面是32路汽车站，它的后面有一条南北胡同“军机处”，里面东西向的胡同叫“老虎洞”，走进是市场、商店，可以买生活用品。那时很多男生抽烟，隔几天就得去一次。0363坚守的二十来个男生，调防住到37楼，任务就是三班倒，守卫这个出口，迎来送往，保护我们的人安全进入“老虎洞”或上汽车，迎接返回的战友。



在通道里值夜班的情形，现在还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外面万籁俱寂，远处灯光稀疏，里面黑咕龙咚。很多战争片里，士兵们在大战间歇，漆黑的夜晚，在战壕里畅想未来，交谈胜利后的打算，有滋有味。我们经常三四个人站岗，当时谈的内容，不记得了。肯定不是未来的事，没人知道“文革”何时结束、怎样结束、将来能干什么。大概是些过去事情的甜蜜回忆吧，不过任何甜蜜的事情，那时也没味道了。或者就是各想心事，自咽苦酒。

“新北大公社”经常往这条马路投掷砖头、打弹弓，也曾砸坏公交车，那个车站不得已搬了家。车站后面有个饭馆，叫“长征食堂”，物美价廉，好吃不贵，几乎每个北大学生都光顾过，我们亲切称之“学七食堂”（北大有六个学生食堂）。在“新北大公社”大弹弓的狂妄滥炸下，它也停业打烊了。

我们这个出口处于南校门和西南校门之间，“公社”的人经常从两个方向来骚扰。一般离得远远的，两边叫骂，互扔砖头，并无当面对峙。有过几次，他们哗啦啦来一大片，我们躲进通道，只看见扎枪沿着床铺之间的缝隙往里乱捅，因为空间很大，有5米之宽，伤不着我们。我们也从里面向外乱捅，作为回敬。和我排在一班的李人杰，经常事后手舞足蹈，“我扎着了一个！亲眼看到的！”他因前额头发有一撮白，被叫“小白毛”，广东人，年纪小，个子又最矮。我们都知道他是瞎说，连对方毛皮也碰不到，不过当时真的是把扎伤对方的人当作一件光彩的事呢。

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打死三个无辜的人。先是19岁的地院附中高三学生温家驹，4月19日在图书馆看书，被抓到生物楼低温实验室，审讯打死。4月27日，地球物理系62级学生殷文杰路过44楼，被公社一伙人围住，乱枪刺去，刺穿了股动脉，死时年仅20岁。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回校办毕业手续，在海淀街上被抓，关到40楼，乱棒打死，24岁。他们没有一个死于战场，都是赤手空拳被抓捕，活活打死的，惨无人道。

自从有人去学校食堂吃饭被抓、被打，那个地方不能去了。一开始我们去海淀买点东西，用电炉各自解决，煮稀饭、下面条是最经常的。后来各系各年级成立集体小灶，就在宿舍里，支起大锅，劈了桌子、椅子烧火。葱姜油酱，米面蔬菜，一应俱全，烟雾缭绕，香味扑鼻。我们年级坚守的几个女生，王文芝、张俭、游君玲、王起云、陈珍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担当煮妇厨娘大任，为将来当贤内助提前实习。男生则是“君子远庖厨”，吃现成的。偶尔帮助买买菜，也可能被抓。校外地派单位，用车拉来粮食蔬菜，集中送，支援这个重灾区。我们这几百号人，实行着毛一直推崇的供给制，大锅饭，官兵一致，平等相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也其乐融融。白色恐怖中的红区，“井冈山”的天是明朗的天。

6月24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楼中的井冈山送菜，“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从东西两面包抄。在我方37楼前，双方发生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砸坏了汽车，打伤了司机。此后我们也不敢擅自离开学校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 （七）

武斗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说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我们被卡在极小的活动空间，只能进行有限的活动，成了有自由的囚徒，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校外的清新空气都是奢望。除了值班，就呆在宿舍里，偶尔翻翻书，也看不下去。要寻求刺激，自我麻醉，更多的时间是打麻将、打牌、下棋。我中学就玩麻将，教别人，天天打得昏天黑地，脑袋麻木。

“睡觉睡到自然醒，打牌打到手抽筋”，这辈子再也没有这么放纵颓废的生活。围棋象棋，有人下有人看。围棋都是初学，有人进步飞快，吕成信、徐秉玖，就下得好，杨惟立后来还

拿到业余段位。赵凯元则是“悔棋大王”，不许他悔棋就跟你拍桌子瞪眼。抽烟，整天腾云吐雾。买来一盒，到处一撒，基本就没了，再抽别人的。

聂元梓“校文革”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必欲置“井冈山”于死地，不令其喘息。软硬两手，文攻武吓，组织上瓦解，思想上摧毁。

为加大围攻力度，“新北大公社”成立了黄树田为首的东线指挥部和技术物理系63级宫香政为首的西线指挥部，准备制土枪、土炮、土手榴弹，派人外出搞枪支。7月，孙蓬一到化学楼101召集会议，要求化学系“公社战士”为武斗做出特殊贡献。

另一方面，扣工资，扣助学金，抓人刑讯，心理战术，“挖山不止”。这个时候，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没有了，只剩下大喇叭。公社广播台连篇累牍，毫不掩饰地高喊“秋后算帐”，将来会无情打击。对抗聂元梓的人，将来都不会有好下场。甚至“工作做到家庭里”，用公函名义给家长去信，施加压力。“井冈山”的两员大将徐运朴、牛太忠被抓，一定是上了不少手段，老徐腿被打断，扛不住了，声明退出，叫“下山”。我们班也有人“下山”，据聂元梓向毛报功时说，下山人数已达一千人。谁要是“弃暗投明”了，还是不得安宁，要发表“下山声明”，参加“学习班”，反省忏悔，给其他井冈山人做榜样。在这点上，老聂玩政治玩到了家，花样翻新，“井冈山”一群涉世不深的学生根本不是对手。

武斗期间，我们班“井冈山”一派的黄关锦在上海卷入一个“反革命集团案”被抓，移交给“新北大公社”审讯。黄在关押期间，寻机逃脱，投奔到“井冈山”割据的楼。“井冈山”决定对其收留，隔离，放置。我是他的战斗队长，他长期在上海，我又写过几封信，通报北大运动情况，决定私下见他。他告诉我“公社”的人对他动了刑，逼他交代我和吕成信的材料，他不得已也做了捏造。我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如翻江倒海，确定自己是在“新北大公社”必整之列，惶惶不安，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在楼里，“井冈山”的同学表面都很振奋，必胜的信心十足。可是我的内心，却很悲观，觉得“井冈山”气数已尽，只是在苟延残喘，最终要被“新北大公社”一窝端。到那一天，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迎接我的将是灭顶之灾。

曾几何时，我们这些人意气风发，以为天下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就是中国的主人，跟着毛，横扫千军，打倒一切。一个武斗，一切虚幻都打碎了。现在成了笼内困兽，瓮中之鳖。失望，怀疑，迷茫，痛苦，万念俱灰，不过这些想法和感觉只能在脑中一闪念，绝不能深思，绝不能发展！太反动，太可怕了。当然，更不能和别人交流，那害人害己。恐怖笼罩着。有人以为文革是大民主，思想自由，殊不知那种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滋味，人人自危，是多么恐怖！

在“割据区”的楼里，我们虽然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可是大家不谈政治，不谈运动，不谈文革的前景。北大向何处去，谁也不知道，上面的表态，根本不要指望，外面的形势，知道的也很少，零星有些传闻，也不够鸡血，提不起精神。

五月份，“新北大公社”把技术物理系学生邓朴方、邓楠兄妹绑架，关了三个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的“罪行”，想给“井冈山”安上一个“黑后台”。邓朴方被逼无奈，跳楼，摔成高位截瘫，终身残疾。这件事是聂元梓的致命失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她再说邓跳楼时已不在位也没用，抓、关、打、审，都和她有关。聂元梓一辈子在识别政治风向上很下功夫，到底还是“有眼不识泰山”，栽了跟头。

## （八）

作为武斗中的小花絮，双方在斗智上也各显神通。

“井冈山”的一个杰作就是“监听电话”。当时，全校电话系统完全由“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控制，“井冈山”在孤楼里打不成电话，监听一下总可以吧。此时尼克松“水门事件”监听电话的事还没发生（发生了中国老百姓也不知道），不懂得这里法律责任的厉害。有原在学校广播台工作过的井冈山人，熟悉地下线路铺设，指出在28楼和30楼之间某处的地下，有一个电缆接口。于是开挖，两个化学系62级的壮汉，每天吃饱了饭玩神秘失踪，像土拨鼠钻地一样去打洞刨土。找到电话接口，连到我们接收器上，两个人日夜监听记录，神不知鬼不觉。“公社”的调兵遣将，电话就报了信。有一次偷袭，他们人刚摸到阵地，“井冈山”早等候着呢，唰的一下，探照灯齐照，再一阵砖头，偷袭者无处藏身，抱头鼠窜。

不过，更是人惊心动魄的，是“新北大公社”巧施“反间计”，让井冈山上层有一次大震荡。——有一天传出爆炸新闻，动态组组长化学系62级的黄××是个内奸，潜伏已久，被撕开了画皮”。黄英俊威武，为人谦和，说话慢条斯理，为井冈山立了汗马功劳，大家常在一起聊天，很有见地，我对他颇是尊重，谁想竟是“内鬼”，人心隔肚皮如此，这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被隔离在一个房间，据说开个小口有人送饭，不准出来放风，不许与任何人接触，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更有甚者，竟有人情绪不好时，闯进去“教训”他一通。

武斗结束大联合时，我才看见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雪白，目光呆滞。“井冈山”的人不理他，“公社”的人也不理他，都拿他当挑动武斗的坏人批。直到“公社”的人自我反省，才爆出背后的惊天秘密。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公社抓了“井冈山”一个人，把眼蒙起来审讯，故意让他模模糊糊看见一点，安排一个长得极像黄××的人晃了几下。这位老兄释放后就上报总部，看见黄××在审讯现场。“井冈山”已是惊弓之鸟，鲁莽行事，犯低级错误，中了奸计，隔离了黄××，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事，是我觉得武斗期间最匪夷所思的一件。或许还有其他内情，但不可否认是一场冤案，“井冈山”莫大的丑闻。几十年后，当年的总部头头侯汉清当面向黄××诚挚道歉。

黄××的事使得武斗绝境中“井冈山”人心惶惶，甚至有流言怀疑另一位头头也可能是奸细。

## （九）

聂元梓围困个井冈山几个月了，久攻不下。“井冈山”风雨飘摇，却还在硬撑着。风传对方要用狠招，断水断电。小试了几次，酝酿着来彻底的断水断电。井冈山得到风声，就有人设计储水池来应对。在36楼弄空了一间宿舍，门窗用砖垒死，四面抹好水泥，只留一个小口，往屋里灌水储存。我还去参观，水管子正在突突送水。有人算过长乘宽乘高这一屋子水够多少人用多少天。没想到，灌到半截，北侧的砖墙就爆裂了水哗哗地向外流。那位设计者，没有计算到砖墙能承受的水压。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小子破开墙，跳进去扑腾洗澡，痛快一番，眼看着水漏光了。

电是更大的问题，懂行的同学作了调查，可以接海淀路上的高压线。一万一千伏高压，带电操作，本身就是高技术含量，高风险，还要在夜间进行，土法上马。更要命的，是“新北大公社”一定会倾尽全力，前来阻止破坏，操作人员的死活他们才不管呐。

“井冈山”事先多次讨论，群策群力，制定方案，具体到每一个细节。关键操作交给技术物理系17纵队，我们03纵负责保卫。记得讨论时，有人建议马路撒绿豆，打滑，公社进攻的人跑不动，看起来是突发奇想，有点像闹着玩，总部采纳了。当年国军中将陈明仁守四平时，就干了一件“撒豆成兵”，把车站大袋大袋的黄豆运到通往天桥的路上，等民主联军准备突破天桥时，突然迅速撕破麻袋，滚圆的黄豆散满桥面，民主联军前仰后翻，行动失败。我们那个灵感，不知是不是由此而来。

7月22日晚，行动开始。我被派守在楼里执勤，没有亲到现场，那精彩时刻都是后来别人给我讲述的。

晚上整十点行动开始，不像现在，还有个什么行动代号。全副武装的“井冈山”守楼学生首先推着一张张木床，冲出37楼那个出口，摆成两排，把马路东西两头封住，简直像演大戏！担任接电的技术物理系三勇士，肖正贵、顾仁虎和关玉霖，迅速出场登上梯子，分处三层位置，依次把一根带有环形夹子的绝缘杆往上传，肖在最上。他把绝缘棒上探，让环形夹勾住一根电线，然后旋转手中的棒，把夹子固定紧，一个线头就接好了。三相电，接了三个头，大功告成！

也许这不过是个常规的电工操作，令人眩目的，是它发生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条件下。

“公社”武斗队早就知道消息，呼啦啦从东西两方向包围，密密麻麻，展开一场恶战。我们的人掌握着制空权，从楼上投掷砖头、打弹弓，来犯者太多了，几乎弹无虚发。他们快接近木床街垒时，又陷入“绿豆阵”，脚下打滑，人仰马翻，智守克强攻，奏效了！

“新北大公社”还使用了自制了燃烧弹，火光四射。其实很简单，一个瓶子里装白磷，一个瓶子里装酒精或乙醚，扔出后，瓶子摔破，白磷自燃，点着了酒精乙醚。

突然间，电来了，灯亮了，成功了！六座楼盘一片辉煌，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喇叭传来“井冈山”广播台播音员激动自豪的声音：“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那么沁人肺腑。

这是北大武斗最高潮的一幕，也是“井冈山”得意的神来之笔。公社社长卢平亲临指挥，挨了一砖头，这回不是“黑把匕首”擦点皮，真的流血了，“光荣”地上医院了。

（十）

“7·23接电”行动给井冈山带来的，不仅是新的士气，更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时来运转。就在随后几天，局势急转直下，北京市革委发文不许武斗，工人组织游行宣传制止武斗，工宣队强行进驻清华平息武斗，最后，雷霆震怒的毛老人7月28日凌晨紧急召见五大领袖，严令停止武斗。一件件事态的新发展，像春风，吹到我们心里。

风云突变，高校全停战。校文革发表了无条件停止武斗的通告。屈指一算，双方交火120天。我们终于从重围中走了出来，重见天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可以到未名湖享受湖光塔影，可以到海淀巷子里的小饭馆胡吃海塞。要是现在，心理医生，“心理辅导”该来了，那时谁听过这玩意。四个月的扭曲日子有没有带来心理创伤？看来我们有钢筋铁骨，很快适应了，投入了新的生活。

没有清华对于工宣队那样的武装抵抗，北大和平解放。结束武装割据，拆除武斗工事，清理武斗现场，上交武斗工具。8月20日，新北大公社上交武器，计有长矛扎枪930支，安全帽518顶，护身甲336副，铁棍200根。8月21日，井冈山交出武器，长矛749支，铁棍71根，护身甲208副，柳条帽432顶，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37发。

我们回到了阔别四个多月的31楼，逃离在外的同学也返校团圆。8月28日22点，新北大公社解散。29日下午3点，井冈山解散。屈指算来，山上只呆一年，觉得阅尽人间事，大起大落，沧海桑田。

北京59所高校陆续都派进工宣队、军宣队。还是两年前遭到批判的刘少奇工作组那一套，只不过不是小分队了，而是人海战术；不是素质良好的领导干部了，而是毫无训练匆忙上阵的工人，以及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军人；不是呆两个月，而是一住好几年。绕了一大圈，原地退步。工军宣队进驻北大是在8月19日。一机床、二机床、外文印刷厂、齿轮厂、财经印刷厂、63军（4587部队），6个单位共492人。这是北大“文革”第四个节点，从此学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北大命运不再由北大人自己掌握。

□ 来源：《华夏快递》2018年5月7日

#### 【亡灵祭坛】

文革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

• 丁向阳 •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64级力学2班有37位同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位同学亡故。他们是王建鑫（又名王建新）、周善丰。2014年我们年级在编写入学北大50周年的纪念册中对他们作了如下描述：

▲ 王建鑫——浙江温州人。1946年3月10日出生。1964年浙江省温州一中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曾任班学习委员、团支部宣传委员，是校乒乓球队队员。1967年8月13日在温州武斗时被枪击身亡。

▲ 周善丰——广西玉林人。1945年11月27日出生。1964年广西博白龙潭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1973年5月12日自刎身亡。

一个班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位同学非正常死亡，在全校也是罕见的。在1967年9月末的北京大学，北大“井冈山”的大喇叭里一直震耳欲聋地响着“向王建鑫烈士学习！”的口号声，王建鑫的名字在当时的北大应该是无人不晓。当年我班张若京与国际政治系64级的陈锡林两位校友（他们分属不同的两派）被派往温州处理王建鑫的后事。王建鑫的情况，张若京同学写了一篇《王建鑫温州遇难的前前后后》，其中写道：1967年8月13号，王建鑫在他的家乡温州死于两派武斗。事后，他所在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温州松台山建了烈士群墓，据说墓碑有约一百五十个之多。王建鑫以王建新这个名字安息在一块冰冷的墓碑下面。

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王建鑫和他在北京各高校的温州同乡一起，串联回过温州。应该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对当地的“造反派”推动很大。所以，后来他活跃在温州一派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层中。中央通知停止串联后，王建鑫短暂地返回北大，但他的注意力仍然在其家乡温州。

张若京文中说：他到温州处理王建鑫后事，到了温州才知道，北京的温州籍大学生在温州组织了一个北京造反团，王建鑫是其中一员。造反团在温州一中有一个房间，是独立的平房，特别扎眼的是，墙角随意堆放着几支自动或半自动步枪，还有手榴弹。可以看出，当时的温州已经是一个战场了。1967年8月13日是温州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日子。那一天，解放军20军的有关部队强攻进入温州。这导致王建鑫所在的一派群众组织从固守的市电报大楼被“解救”出来，继而占领了整个市区，而原来占据市区的另一派则退守到了郊区。本来这一天应该是王建鑫这一派群众组织的“胜利”之日，没想到，他们误以为对方组织已经被彻底消灭，竟然所有“头头”大约7、8人乘坐一辆卡车从市区到郊区去视察了。下午，卡车开到牛山附近，遭遇对方伏击。一个头头在车上被射杀，王建鑫从车上跳下后中弹身亡。其余头头全部被俘。所幸出事地点附近有一个部队的饲养场，发觉出事后就有指战员出来处理遗体。摸了王建鑫的衣袋，发现北大学生证后立即辗转通知北大。

当时的北大两派严重对立，王建鑫所在的群众组织邀请王建鑫全家来到学校，举行了追悼会。我们班的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校乒乓球队的多数同学也参加了。

周善丰的事情知道的人就很少了。周善丰性格比较内向、文静，高高的个子，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文革”中搞大批判时，由于他文笔好，经常代表小组或班级写大批判发言稿和文章。1967年，在兴起“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后，1月18日周总理在讲话中说：“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根据周总理的这个讲话精神，北大“校文革”派人去高教部夺权。当时在西单的大木仓胡同有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但两个部在一起搞运动。高教部有以卢正义、徐非光为首的“延安公社”，教育部有以中下层干部和工人为主的“北京公社”。这两个群众组织在观点上是互相对立的。“延安公社”的头头卢正义是一位司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但有政治历史问题：三十年代他在国民党的江苏反省院一个出版物上写过一首诗，诗文如下：

转变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道路。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荆棘丛生，  
是因为荆棘的尽头找不到花园。  
我抛弃了旧日的路程，  
踏上了新的行程。  
这不是因为旧路的崎岖险恶，  
是因为崎岖的道上找不到山泉。  
我憧憬着美丽的花园，  
我渴望着清澈的山泉，  
我抛弃了旧日的行程，  
踏上我新的道路。

现在看来，这首诗还挺有文采，但就因为这首诗，卢正义被打成了“叛徒”。徐非光是高教部的一位处级干部，1965年参加过北大的“社教”，北大哲学系的聂元梓等“左派”认为他是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叛徒”（被北大“左派”指为“叛徒”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原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萍）。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一派的“井冈山”和社会科学学部以潘梓年、吴传启为首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是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北大是反对“延安公社”、支持“北京公社”的。北大“校文革”派了一批人马去教育部夺权，我们班的周善丰、李德鸿和我受系文革派遣坐大卡车跟着去了教育部。当时参加教育部夺权完全是“校文革”官方组织的。这是我第一次迈进教育部的大门，一座像北大西校门一样的宫殿式大门。所谓夺权，就是“北京公社”把他们收集来的教育部大印（教育部印和各司局的印）交给了北大来夺权的人。北大在教育部大院里支起的大喇叭宣布“夺权成功”。当时局面极混乱，一口袋大印怎么办呢？北大去夺权的头头觉得我们数力系的三个小伙子还挺精干，于是就把这一口袋大印让我们班的李德鸿同学用一个书包背着，周善丰和我就守在左右，寸步不离地保护着他和大印。我们三个人围着一口袋大印整天担惊受怕，生怕对方派人来抢。白天院里的大喇叭整天播放“夺权声明”，播放卢正义的那首诗，播放“打倒叛徒卢正义、徐非光”的口号，所以我对那首诗的印象极其深刻。晚上我们就睡在原来部长办公室的大皮沙发上。后来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在高教部搞了反夺权。2月2日下午，关锋、王力打电话批评北大，北大的夺权大军就撤出了教育部。教育部的大印还给了教育部“北京公社”，我们三个人总算卸下了肩上的重担，轻松了。

高教部夺权事件后，北京市的高校逐渐分裂成了两大派：以北大“新北大公社”和北航“红旗”为首的“天派”及以北师大“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

回到学校后不久，“校文革”指派参加高教部夺权的哲学系青年教师赵建文出面组建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参加过教育部夺权的周善丰加入了“除隐患战斗队”。当时“除隐患战斗队”的主要目标是从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入手，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潘梓年、吴传启的材料，因为他们都是一派的。打倒潘梓年、吴传启，把矛头直指他们的后台林杰、王力、关锋、戚本禹。当时“除隐患战斗队”是“新北大公社”和北师大“井冈山”两派斗争的笔杆子、是“文攻”的主力军。1967年9月，王、关、倒台了，但“除隐患战斗队”并没有解散。有人说聂元梓“炮打谢富治副总理”，怀疑“除隐患战斗队”在整谢富治的黑材料。当时谢富治在中国政坛上正炙手可热，谁也不承认“炮打谢富治”的事。周善丰在班里从来不谈论在“除隐患”的事，每天匆匆忙忙地去“除隐患战斗队”工作，晚上很晚才回宿舍。我和周善丰虽然同属一派、同住一个寝室，生活方面无话不谈，但他从不说“除隐患”的事，显得很神秘的样子，看来保密意识还挺强。所以我对他在那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也一无所知。直到1968年8月19日北京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北大，北大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都解散时，周善丰才回到班级参加运动。周善丰是个白面书生，君子动口不动手，在“文革”中他虽然是“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一点与武斗相关的事。在北大发生武斗期间，我们班的两派同学在校内外的问题上分歧很大，有激进，有保守，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但在班内都能和睦相处，帮对方的同学拿行李提供方便。所以我们班同学在几十年后再相聚时能一笑泯恩怨。

1970年3月毕业时，周善丰被分配留校工作，按说毕业能分配留校是很不错的去向。当时，力学系在汉中653分校，他也就留在了汉中。他进了力学系的流体力学教研室。老教师帮他补一些“文革”中落下的专业课，同时，他给新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补基础课，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的。但好景不长。北大是个是非之地。到1973年，“文革”的风暴还刮个不停。北京清查“五·一六”的风暴刮到了汉中653分校。3月份653分校播放了北大批斗所谓“五·一六”分子的录音，聂元梓、孙蓬一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周善丰听到消息后震动很大，惶恐不安。当时我们班留校的一位

同学和他谈心，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紧张。后来那位同学出差外地两个多月就没有机会再和他沟通了。周善丰脆弱的神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点绷不住了，整天疑神疑鬼，以为别人要整自己。1973年5月12日中午，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拿起小刀割了自己的脖子。他把气管割破，血流了一地，血流出了门外，才被其他老师发现，喊人帮忙急救。气管破了，周善丰痛苦万分。由于汉中分校医务所的条件太差，护士只是把他的伤口稍微处理了一下，插上了一小根管子，暂时维持生命；然后用一辆汽车把他送往30公里外的汉中县医院。送到县医院时，那根插在气管里的管子在路上被颠掉了，周善丰已经气绝身亡，永远离开了人世。

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文攻武卫”。1967年8月，王建鑫作为北大“井冈山”的一名战士，去温州支持造反派，到了两派武斗的现场，不幸在“武卫”中遇难。他可能是北大“文革”中第一位意外亡故的学生。周善丰参加“文革”的“大批判”写文章、整整材料，按说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他精神上太投入了，钻进了路线斗争的牛角尖不能自拔，1973年5月，最终在“文攻”的余波中，精神崩溃，自绝了生命，他可能是北大文革中最后一位非正常死亡的学生。王建鑫、周善丰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没有文革他们都应该有美好的前程，回顾王建鑫、周善丰的鲜血，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反思吗！？

王建鑫和周善丰在北大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不同的两派，在校内外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也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忠于毛主席，相信“中央文革”，他们都年轻、聪明、善良、执着，对信仰专注，坚持自己的观点，争辩起来会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对立面看作“反动路线”，攻其一点，“无限上纲”。他们在“文革”中太投入了，以致于置生命于不顾。王建鑫会拿起枪出现在危险万分的“武卫”现场，周善丰会为了路线斗争“文攻”的理想了断自己的生命。他们都认为自己在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献身。实际上他们都上当受骗了，成了文化大革命“文攻武卫”罪恶口号的牺牲品，在二十多岁的青春年代，就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说起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我们每一位参与文革的北大同学何尝不是牺牲品！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的教育停滞了十年，这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等大学仍照常开办。“文革”中，北大学生停课闹革命，大串联，贴大字报，荒废了学业，最终没有拿到正规的毕业文凭就被赶出了北大。我们班两派的大多数同学都被发配到了与专业毫不相干的远离家乡的最为艰苦的农村、农场或工厂等最基层单位，我被分配去了云南山沟里的国防工厂。还有，在“文革”的十年中，我们投身运动，跟在后面摇旗呐喊，浪费了十年宝贵的青春年华！

改革开放后，恢复了高考和考研究生制度。我们班有10位同学回北大“回炉进修”，有7位同学考上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有13位同学在高等院校当上了教授。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果王建鑫、周善丰不是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也一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50多年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也已经40多年了。但还有一些同学没有完全抛弃“文革”的思维方式，说来说去还是当初自己一派如何如何“正确”，对立面如何如何的“不是”，为本派“文革”中的一些“激进分子”鸣冤叫屈、歌功颂德。其实在“文革”中，两派的“激进分子”激化了各种矛盾，直至发生流血冲突。他们自己也不同程度地自食苦果。回顾王建鑫、周善丰的悲剧，想想我们能侥幸生活在当下的幸福，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呢？



2014年，在纪念北大数学力学系64级力学二班入学北大50周年的同学聚会时，我们班的张文同学写了两首诗来悼念他们，抄录如下。

#### ▲ 悼王建鑫

建鑫聪明又坚执，学海初展鸿鹄翼。  
怀抱真情身许国，书生哪里懂政治。  
本是血雨腥风场，热血青年作儿戏。  
可惜温州一才子，荒沙一丘风流逝。

#### ▲ 悼周善丰

善丰与我同室居，家境贫寒无所依。  
体貌修长心灵善，文革风浪走不出。  
可叹一位好青年，褒河边上早安息。  
每逢念及周君事，一袭悲凉情唏嘘。

2017年6月2日于北京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 【国际风云】

#####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 何与怀 •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又有一个让朋友遍天下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不得了。据说它萌芽于19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19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19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对赞比亚总统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的意思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毛泽东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而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在毛泽东这个伟大理论的光辉照耀下，与中国亲密国家依次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然后是罗马尼亚、赞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等。当年中国很穷，但对这些国家却是出手非常慷慨大方。一时之间，毛泽东赫然交了一些朋友——是否真假是否靠得住是个疑问，但确是如当时人们所戏称的“小朋友、穷朋友、女朋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国际上更集拢一批小兄弟——他们不久前还不见经传，很多就是某个国家某个城镇社会底层打工者甚至无业者，可是霎那间便变成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而且勇于“拔刀相助”的中共战友！话说当年中苏公开分

裂之后，毛泽东的中共以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连发“九评”，大义凛然批判、对抗“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后来升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很不幸，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大都不为所动，也变“修”了，仍然和可恶的“苏修”眉来眼去，互送秋波，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和中共作对。于是，要寻找和培养新战友了。就在此种形势下，一大批标榜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并注明绝对是“马列”的某某国“共产党（马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毛泽东自然大喜，直觉得“吾道不孤”，果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像对“第三世界”亲密国家一样，对这些毛派共产党小兄弟非常亲热，常常是有求必应。他们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这些“马列”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说他们真真假假，的确一时真假难辨。也许，毛泽东和他的有关手下，已为他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喜出望外；而且，文革又是个非常时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虽然当权，但很需要国际朋友、战友的捧场。那些年，一般中国人，常常在报纸看到，在大小宴会厅里，或在天安门城楼上，经常出现为数众多看不清面孔记不住名字的各种肤色人物；每当有什么喜事丧事，报纸上又是一大串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的贺电或者唁电，令人眼花缭乱。

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边，终于激发了美国中情局 CIA 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发现有机可乘，就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 BVD (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 (Pieter Bouvé) 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 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Van Nederland) 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 (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 2004 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据有关资料表露，荷兰国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 (Frits Hoekstra) 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 In Dienst Van De BVD (为荷兰国安局效劳)，书中详细描写美国中情局如何与荷兰国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骗取中方信任的计划，其行动代号、方案一应俱全。

这位冒牌荷兰马列党总书记彼德·贝维原为一个普通的荷兰数学老师，1955 年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后被 BVD 吸收为荷兰安全局特工。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也应邀访问过中国，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 (CPN)。1968 年文革高潮并且中苏对抗剧烈时，他按情报组织指示煞有介事地伪装激进，公开从荷兰共产党分裂出来另立了个荷兰马列主义党，宣称紧跟北京的路线，与荷兰共产党相对抗。这可是了不起的“壮举”！荷兰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也算举足轻重，曾在二战结束时获得百分之十的选票，在当时的荷兰国会二院有十个席位，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党员也有上万人。但是这个荷兰共产党是亲苏的，彼德·贝维这一俨然勇敢坚定的举动，当然博得当时与苏联不睦的中共的极高赞赏。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号称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在里面的真实党员为二十五名荷兰特工，此后还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义的上当受骗者），也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

于是，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 1970 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华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 BVD 和 CIA 提供

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则是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当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兰定期编制出版“革命”杂志荷兰版的《共产党人》，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1972年后为大使馆）；每逢中国的喜事和丧事，则是像模像样地及时向北京发贺电和唁电。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和所有的中国其他报纸就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谨代表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对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你们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地铭记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令人永志不忘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主席霍赫

书记彼得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于哈勒姆

彼德·贝维这项胆大包天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为何要取这个很刺激很伤人的名称？莫非摆明要讽刺要嘲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是啊，毛泽东生前自然为在全世界有彼德·贝维这样一大帮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悦，一定为他的“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而洋洋自得，最后去见马克思时一定还怀抱着伟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坚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浑然不知自己被骗了，自己死后人家发来的赞颂洋溢的唁电也是假的。

不过，说到诈骗变脸背叛之类，彼德·贝维的这个荷兰马列党对中国的伤害，比起某些“兄弟党”，其实算是最小的，简直微不足道。那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从1954年起至1976年，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亿元。那时它总人口才两百万，相当于平均每位国民四千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脸之后，阿共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大著，全面指责中共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比如古巴那个卡斯特罗，接受中国援助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毛泽东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那个“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真可谓养虎为患，金家三代不断讹诈，现在搞成功核弹，威胁中国如对它实施经济制裁，便将有灾难性后果。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鳄。原来说什么“同志加兄弟”，转头便大打起来。中共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粮”。“血染的风采”，是用中共赠送的枪炮染红的！……可叹的是，毛泽东为了要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世界革命，几十年慷国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国民众的血汗钱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这不折不扣也是一种另类骗局，真是荒诞绝伦，怵目惊心。

进而论之，应该说，输出革命并非毛泽东首创。首先是从列宁开始。他的苏维埃政权刚稳定，便规划世界革命，开始对外输出。最初中共建政也是在苏共的援助下取得成功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如林彪所说，毛泽东思想的确成了马列主义最高最高的顶峰。毛泽东以伟大革命者的气概，断然判定苏共“修”了，也与它反目成仇。更了不起的是，毛泽东非常成功地让中国民众死心塌地地相信他的判决，相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相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反修”“防修”，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

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解救。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中国人，要把红旗插遍全球去解救别人了。而在全世界，从欧美发达国家大城市到亚非拉落后荒芜的农村野林，也出现不少狂热的毛派追随者。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革命友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真是狂热荒唐的年代！当时，许多人真以为挽救世界的真神就在北京并为此欣喜若狂。这何尝不是更大的骗局，而且是内骗中国民众外骗世界毛派追随者的更成功的世纪大骗局？！

再回头说说彼德·贝维的这个冒牌荷兰马列党。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它就自动解散，因荷兰国安局觉得此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2004年后，彼德·贝维的真正身份随着这个骗局的揭露也公开了。这个虚假然而卓有成效的政党终结后，他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不无自豪地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现在，在他居住的一万七千人的荷兰小镇上，垂垂老矣的彼德·贝维也算名人一个。提及当年他那段经历，他说他那些行为当然也有风险。他曾被告知，如果事情败露，不会有人帮他的，一切责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他并不后悔，“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骄傲”。他对在中国的“国宾”待遇还念念不忘——“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很乐意更很得意地加以证实。

文革是荒唐的年代，才有上述冒牌荷兰马列党更有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种骗局套骗局的荒唐之极的事情。现在，人们不免还会担心：荒唐会重演吗？

（2018年2月2日）

□ 摘自《华夏快递》2018年4月23日

~~~~~

# 【劫后反思】

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清华人对于文革的反思  
——《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序言

• 华新民 •

三年前孙怒涛编辑出版了《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这次又编辑了《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这本《讨论集》可以看作是《反思集》的续篇。大概因为本人对《反思集》中的若干文章作过一些介绍和评论，蒙孙学长抬爱，命我为这本《讨论集》写一篇序言。

我虽然同孙怒涛以及文集中的大多数作者一样，在大学求学期间恰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最初几年，但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而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科大的校园当时在北京西郊邻近八宝山的玉泉路，远离集中在京郊西北方向的清华、北大以及包括地质、航空等学院在内的“八大学院”，而且科大规模小、人数少，无论从地理上和政治能量上说，都属于一个边缘化的学校，在北京市的文革运动中没有多少影响。不要说北大、清华，就是同北航和地院相比，也望尘莫及。

当然，北大、清华之所以在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文革运动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主要还不是它们的规模，而是它们的运动直接受到中央高层——按当时的说法是“两个司令部”——

一的插手控制：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毛泽东直接指令在1966年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成为全国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发端。毛泽东进一步在8月5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将聂的大字报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时造就了聂元梓在北大不可挑战的地位。在清华大学这边，刘少奇则在6月初派出工作组进驻各高等院校的时候，通过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的王光美直接控制该校的文革运动，也导致了后来学生的强烈反弹，为自己的垮台准备了掘墓人。

不过，在工作组撤出学校（1966年7月末）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从本人这样边缘化的学校里的学生来看，清华的运动显得远比北大“精彩”，用孙怒涛在《反思集》前言里的话来说，称得上“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北大的运动完全处于江青—中央文革的强力控制之下，例如在7月下旬的辩论会上，江青为了压倒替工作组辩护的意见，不惜家丑外扬，痛骂替工作组辩护的自家儿媳和她的家庭。这种不加掩饰的一边倒使得全校上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臣服于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聂元梓。聂派的势力始终占有压倒性的地位，其他不愿归顺的力量统统属于“弱势群体”：其头头受到强力打压，不同意见得不到充分表达，武斗也是只有招架之功、无回手之力。这样的一边倒局面，沉闷而没有悬念，在北京的高校中并不典型。所以在众多的其他高校学生的眼里，同自己的文革经验相差甚远。

清华大学的运动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工作组时期虽然受到王光美及工作组的直接干预，搞了一场压垮蒯大富及其同情者的斗争，但是在工作组撤出之后，江青及中央文革成员有近半年时间未踏进清华校园，学校运动由周恩来全权“过问”。而周恩来的风格同江青—中央文革那种风格迥异，很少对学校的运动作旗帜鲜明的表态。即使在宣布替蒯大富平反时，也只是表示蒯不是反革命，并未把他抬到革命左派领袖的地位。对于学生的种种激进行为，周一般采取劝说的办法阻止，少有江青那种泰山压顶式的批评指责。这就使得清华大学的运动具有更多的“自由度”，涌现出许多个人风格鲜明的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完全不同于北大那个老气横秋的干部聂元梓。后来两派的势力也不像北大那么悬殊，使得不同意见的争论得到一定程度的展开，两派都撰写了一些有广泛影响的文章，有的甚至上达毛泽东的“天听”。双方的武斗也打得难分难解，各有伤亡，以致毛泽东最后只能动用工宣队和军队加以平息。事后来看，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显然得益于周恩来接过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时所用的口号，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因而也更接近于群众运动的自发轨迹，跟那些没有高层领导直接插手的北京和全国高等学校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使得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比北大更有代表性，回顾和讨论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也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这也是本人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把更多的眼光投向清华的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清华文革的参与者在文革结束多年后的反思，远远领先于全国其他高等院校的文革参与者。在文革结束30周年的2006年前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也随着文革参与者渐入退休年龄，他们冲破当局对于文革研究所设置的障碍，开始回顾和反思自己青年时期所经历的这一场被杨继绳学长称为“天地翻覆”的政治社会动荡。清华大学的同学在这方面无疑走在了其他学校同学的前头。如果以书面的回忆录、文集和资料汇编作为标志，在过去十几年里，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已经（主要在香港和海外其他地方）出版了十几部有关的著作。作者几乎涵盖了原来清华各派的领袖人物和积极分子，如蒯大富、陈继芳、陶德坚、沈如槐、周泉纓、孙怒涛、叶志江等等。他们在尘封了三十年后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界之内，真可谓“大字报端寻常见，京师学苑几度闻，吹落尘土三十载，朝花夕拾又逢君。”除了他们以外，数量更多的原来不那么知名的学生和教师也参加到这个回顾和反思文革的行列中来。

我们手中的这本《讨论集》也是所有这些回顾和反思的最新成果汇编。如果同2015年出版的《反思集》和其他清华校友的文革回忆录相比，可以看出这本文集在反思文革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进了一步，反映了清华大学当年的文革参与者在“艰辛探索”——一个现在流行的词——文革的根源和历史教训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三年前的《反思集》中大部分文章是属于回顾性质：对于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死难者的回忆。这是所有历史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没有停留在对于往事的追忆上，而是较快地转入了对文革的进一步思考。在《反思集》及其前后问世的清华文革出版物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许多作者在回顾了文革的个人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基础上，探讨了文革发生的根源。而这本《讨论集》则以更广阔深入的视角，从领袖、政党、社会、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等角度全方位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涉及了许多其他的文革参与者较少思考的问题，例如：反思的时间段从文革最初两年学生主导运动的时期向前追溯到文革同反右的关系，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关系，同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的关系；向后延伸到由毛泽东直接掌控学校的时期，即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直到文革结束的八年，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直至严重撕裂的今日中国社会。反思的范围从本校文革扩展到全局性地探讨导致文革发生的必要和充分的因素以及导致文革失败的原因。个人的反思也从自己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追溯到文革前的党化教育、“九评学习”和阶级斗争教育等等。

清华文革参与者的文革反思能够达到如此的深度和广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知道文革中的派别斗争十分激烈，甚至发展到刀枪相向的武斗，使文革参与者在回顾和讨论中不免陷入谁是受害者谁是施害者的争论，往往纠缠于历史细节的是非对错和个人恩怨而不能自拔，这在许多学校、单位的文革反思中十分常见。拿清华大学来说，双方在武斗中互有伤害，仅在校园武斗中死于对方之手的就有十人左右。清华大学文革的两派的绝大多数参与者能够做到化解怨仇，对历史求同存异、共同反思和探讨文革的根源和历史教训，环视全国，这样的现象不多见。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在这个方向上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在我看来，是有一些独特原因的。

首先，清华大学的文革经历者中有一批对国家和民族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阅读这本文集和清华文革亲历者的其他出版物，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历史责任感。请看这样一些文字：“这两、三代人体验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是平静岁月中无法相比的；他们观察社会的眼界和对社会认知的深度，是平静时代的人们不能达到的。非凡的记忆，非凡的体验，非凡的认知，应当是这两、三代人最重要的遗产。前两代人多已告别人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保有这些遗产。……不把这份遗产著之竹帛，传给后代，就可能永远地消失了！这将是死不瞑目的重大遗憾！”（杨继绳）他们认识到，十年文革，导致了学业荒废，亲友反目，同学相残，祸及社会，这种深刻的创伤和教训，是不能遗忘的，“因为遗忘，意味着亿万文革受难者的苦白受，血白流，命白丢；因为遗忘，意味着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孙怒涛）所以，拒绝遗忘，保存记忆，传诸后世，应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陆小宝）。这些言辞反映了大多数清华文革亲历者的一种共识，并成为他们捐弃前嫌、共同探索的出发点和动力。

其次，这批深具历史责任感的人中有若干带头人物——其中很多恰好也是原来文革中的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了许多普通的文革经历者也参加到回顾和反思文革的行列中来。尤其要在这里提到的是本书的主编孙怒涛，他原是文革中四一四派的主要领袖，文革后痛定思痛，撰写了长篇文革回忆《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思所行作了坦诚而严格的拷问，在反思的时候完全跳出了当年的派别立场，受到原来两派师生的一致推崇。不仅如此，他还在古稀之年编辑了这本《讨论集》和它的上篇《反思集》，收录同学们的文革回忆和反思，并在当局的重重阻挠下组织网络组群和校友研讨会交流对文革的思考。清华文革的回顾和反思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深

度，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孙怒涛和其他带头人物的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他们的努力还催生了最近出版的出自清华人之手的几部重要著作，那就是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以及阎淮和陈楚三的个人回忆录《进出中组部》和《人间重晚晴》。这些著作标志着清华文革经历者已经从回忆和反思个人的文革经历，扩展到对文革十年全局性的政治上和学理上的总结，以及追溯到个人所经历的长达七十余年的历史时期的回顾。

此外，我在这里也必须提到清华大学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在化解文革仇恨，促进两派师生和解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罗征启作为清华大学文革前的中层干部，因支持四一四派而遭到团派的囚禁和刑讯逼供，在出逃后受到团派的追捕，导致自己弟弟死在追捕人员的手中（罗征启近年出版了《清华文革亲历记》，回顾和反思自己亲历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原来团派的骨干分子孙耘（孙毓星）因为对此命案负有责任而无法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孙耘为此向罗征启求援。罗向孙耘的上级部门申明他本人及全家不再追究他弟弟命案的责任人，他进一步给哈工大写信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使同志之间产生不少隔阂，甚至结下怨仇。……现在是化怨解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时候了。有些青年人，拉一把就可能是一个很有用的人才，应该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锻炼成才的机会。罗征启的表态为哈工大录取孙耘为研究生除去了一道重要的障碍，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又直接批示，使孙耘得以成为哈工大的研究生。罗征启的高风亮节，受到清华文革中的原两派领袖和群众的一致尊崇，使得斤斤计较文革中两派恩怨的人自觉渺小和无地自容。我觉得其他学校和单位不能像清华人一样两派和解，共同反思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缺少罗征启一类对于两派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

最后我想说，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这些清华大学的文革参与者对文革的历史及其教训所作的探索之路，也是一条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道路。我们知道，这是清华大学前辈师长所提倡的理念。然而，在文革前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的领导在学生中灌输的是这样的理念：做“听话、出活”的“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使得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被连根拔除，消弭殆尽。相信当年投入文革运动的青年师生中，多数并不知道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的传统，少数知道的人也早已对它嗤之以鼻。不过清华的文革经历者毕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英人才，具有足够的思维能力，只要摆脱了利益的羁绊和思想的桎梏，那么他们通过自身的文革经历和见闻，以及从学校进入社会后的体验和观察，自然会在思想上走向自由，精神上走向独立。而一旦回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更广阔的视野回顾文革和它之前的十七年，就会觉悟到当初那些派别恩怨实在不值得耿耿于怀，批判阶级斗争理论，否定个人崇拜和仇恨教育才是总结文革教训的正道。

这条精神求独立，思想求自由的道路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所不同，有人可能有一些飞跃——就像佛教里说的“顿悟”。如许多人都在回忆中说到，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事件对自己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使自己过去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豁然开朗。不过他们最终都从黑暗和愚昧中走出来，殊途同归，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思想境界。顾城的诗篇《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正是这种从意识形态专政的牢笼里挣脱出来的艰辛过程的写照。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